

试论我国农民战争中的神学异端

唐明邦

一提到宗教，往往就简单地说它是“人民的鸦片”，信教是愚蠢的行为。可是，打开中外历史一看，多次农民运动都打着宗教的旗帜，那些杰出的农民领袖用宗教去组织革命队伍，宣传革命主张，领导革命农民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戏剧，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业绩。对于这种宗教，即农民战争中的“神学异端”，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评价呢？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无神论学术讨论会上，是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弄清这一问题，对于研究历史、哲学史、农民战争史、农民革命思想史以及宗教史、无神论史、民间文学等，都是十分重要的。本文仅就宗教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神学异端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曾爆发过上千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起义农民为了反对野蛮残暴的封建统治阶级，采取各种方式把自己组织起来，以开展有目的有领导的斗争。神学异端是起义农民多次利用的组织手段之一。

封建统治阶级泡制和宣扬了形形色色的宗教神学，愚弄劳动人民，维护封建制度，巩固封建政权。起义农民为要触犯那吃人的封建制度，摧毁地主阶级的政权，不得不剥去宗教神学给封建制度蒙上的神圣外衣；适应受正统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就借用宗教的形式，让自己的革命利益也披着宗教的外衣出现，于是产生了神学异端。神学异端是在正统的宗教神学流毒社会，广大人民被正统宗教神学的欺骗所激怒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神学异端是在同正统神学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它是一种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是自成体系的一种社会上层建筑。

在封建社会里，正统的宗教神学，为野蛮黑暗的封建制度的万古长存祝福，它极力熄灭革命人民的怒火，阻止他们起来同封建统治作斗争。一旦劳动人民忍无可忍，逼上梁山时，“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401页）神学异端和正统宗教神学是相互对立的两类不同的宗教，它们无论在信徒的成分、崇拜的神灵，传法的仪式以及组织的方法等方面都是大不相同的。这两类宗教的对立和斗争，是世俗社会阶级对立和斗争的反映。由于农民和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利益的不同，决定了神学异

端和正统宗教在阶级性质和政治倾向上都是不同的。

二、我国农民战争中神学异端的几种形式

农民战争中的神学异端，随统治阶级所推行、信奉的正统宗教神学的变化而变化。由于时代条件不同，反对正统宗教神学的斗争任务的不同，神学异端的形式和内容也是不同的。有封建压迫，就有反抗封建压迫的革命斗争和在斗争中产生的革命纲领、口号；有封建宗教神学的精神奴役，就有反抗这种精神奴役的斗争，从而也就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精神武器——神学异端。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属于神学异端这种类型的宗教，曾经有过许多种形式，同一种异端宗教又曾有过多种不同的教派。名目繁多，毋庸备举。仅择其要者，略加评述。

（一）谶纬神学的异端——张角的太平道。

东汉末年，黄巾农民大起义，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种神学异端——太平道教。

两汉时期，封建统治者发展殷周以来的天命论，泡制了一整套适合维护封建制度的正宗神学。这一正宗神学，由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奠定理论基础，逐步发展为谶纬神学，到东汉白虎观神学会议制定了神学法典——《白虎通义》而更加完善。正宗神学的基本思想是“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天人三策》）。把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加以神化，用神权来强化君权、族权和夫权。

黄巾起义竭力砸烂封建统治者强加在农民头上的精神枷锁，他们借用谶纬的形式，表达革命的政治内容，提出的革命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后汉书·皇甫嵩传》）起义农民称封建政权为“苍天”，农民革命政权为“黄天”。破苍天、立黄天，是农民革命纲领，也是革命的理想。它以神学异端形式，预言革命的胜利和理想的太平世界的到来，这对农民军是巨大的鼓舞，对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正宗神学是有力的打击。起义农民以太平道教为组织手段，秘密地发动群众，做到八州三十六方“一时俱起”，“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同上）。黄巾起义是当时社会阶级矛盾的集中暴发，起义军能够三十六方同日而起，是由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所决定，但是他们借用谶纬形式表达的革命愿望，切合了农民群众当时的思想感情，利用神学异端作组织手段，进行秘密而扎实的革命发动，这对革命运动的开展也是有益的。太平道对农民起义的积极作用同谶纬神学对人民的毒害作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佛教的异端——法庆的大乘教和红巾军的白莲教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一开始就得到封建贵族的崇奉和保护。南北朝时期，由于某些封建帝王的带头剃度、舍身佛寺，佛教流毒全国，寺院经济恶性扩展，僧侣贵族集团左右朝政。劳动人民除受世俗地主剥削外，更遭僧侣贵族的盘剥；政治压迫之外，备受精神奴役。劳动人民和下层僧侣，拜佛最勤，受压迫最重，他们不能不怀疑，“天国”竟在何方？他们对尘世的苦难，不能再忍受了，毅然揭起佛教异端的旗帜，实行武装起义。从南北朝到明清时期，佛教异端的各种教派，此伏彼起，名目甚多，对农民革命运动，起了巨大直接影响。

北魏延昌四年（公元515年）沙门法庆以佛教异端“大乘”教起义于冀州。他宣称“新

佛出世，除去旧魔”。所到之处，“杀害吏人”，“屠灭寺舍”。为鼓励起义军英勇杀敌，规定“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为十住菩萨”（《魏书》卷十九上，《京兆王传》）。封“十住菩萨”李归伯为平魔军司、定汉王，统领起义军同封建统治者进行武装斗争。法庆遇难后，熙平二年，大乘教余众再次起义于瀛州。后惨遭失败。这次起义被镇压后，封建统治者供认：“冀瀛之境”，“死者既多，白骨横道”（《魏书》卷九，《肃宗纪》）。足见大乘起义军同封建统治者斗争十分英勇顽强。

以佛教异端发动的另一次著名的起义，是元末红巾军起义。他们用白莲教进行秘密组织发动，向教徒宣传“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光明战胜黑暗，人民不再过痛苦生活的理想。他们的教规是不杀平民，互助合作，团结一致。他们以治河工地上饥寒交迫的民工为基本群众，预先埋下独眼石人于河底，传播“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七）的民谣，作为起义的信号。起义军自称“魔军”，声称“天遣魔军杀不平”，“杀尽不平方太平”（《新元史·韩林儿传》）。

本来佛教苦口婆心劝人要以慈悲为怀，无数的清规戒律，首先是教人戒杀，不可杀任何生物，更不可杀人。可是以佛教异端为旗帜的大乘军和红巾军，却与佛门正法针锋相对，主张无情地惩杀反动官吏，豪绅地主和作恶僧尼，坚信“杀尽不平者”是实现“太平”的前提，因而规定以杀人的多少，来评定“活菩萨”们功业的等级。充分显示出佛教异端同正统佛教是大相径庭的。

（三）摩尼教的异端——方腊的明教。

唐宋以来，封建统治者竭力调合佛教、道教和儒学的矛盾，使“三教合流”，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宋代表面上以唯心主义理学为封建统治思想的核心，其实这种新儒学已揉合了佛教的某些教义。当时以儒学为正宗，佛、道充当两翼，合夥毒害劳动人民。劳动人民身受三支神学的统治，理所当然地要同三种神学作斗争。

北宋方腊起义时创立的神学异端——明教，就是同儒、佛、道三支宗教神学斗争的产物。方腊起义表面上是利用摩尼教，其实它同波斯传入的摩尼教不是一回事。方腊的明教是改造摩尼教而成的神学异端。方腊以明教为旗帜，揭露封建等级制度下的社会黑暗，“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庄季裕：《鸡肋编》）。他宣扬一个与现实社会相反的“永乐”世界，那儿“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反对理学维护的“三纲五常”，主张官兵平等，“男女无别”。反对佛教宣扬的慈悲普度，主张“只有杀人，才能度人”，“只有杀人，才能成佛”。“见官吏、公使人，皆杀之”（洪迈：《容斋逸史》）。认为只有杀尽这些黑暗势力的代表者，才能把劳动人民救出苦海，进入光明世界。起义军反对祖先崇拜的传统信仰，提倡独特的裸葬方式。总之，“不事神、佛、祖先”（廖刚：《高峰文集·乞禁妖教札子》），向三教同流的佛、道、儒学公开宣战。

（四）基督教的异端——洪秀全的拜上帝会。

鸦片战争前后，随殖民主义侵略的深入，西方基督教广泛流毒中国。革命人民反神学的斗争，又增加了新对象，在反对儒家宣扬的正宗神学及佛教、道教的同时，还要同殖民主义的宗教侵略作斗争。

鸦片战争失败后，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日益深入，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压迫也日益加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极端尖锐化。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代表先进的中国人向

西方寻找真理，力图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他吸取了西方早期基督教的平等观念，结合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创立了新的神学异端——拜上帝会，用中国人民易于接受的方式，宣讲“皇上帝”同“阎罗妖”的斗争。他把基督教的上帝，改造成同情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皇上帝”；而把一切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宗教神灵，统统宣判为理应斩尽杀绝的邪神、“阎罗妖”（洪秀全：《原道觉世训》）。“皇上帝”的信徒——太平天国革命勇士们完全背离基督教所宣扬的“和平”、“博爱”的教义，坚决主张：“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洪仁玕：《洪仁玕自述》）。他们攻击儒家宣扬的“三纲五常”，也反对基督教讲的假平等，主张通过革命斗争，在现世实现政治、经济、社会、男女四大平等。

拜上帝会是中国农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独创的神学异端，它同流行中国的各种正统宗教神学都是对立的。起义军所到之处，所有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宗教寺院，无不遭到毁灭。封建卫道士曾国藩沉痛地哀叹道：太平军“焚柳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之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象不灭”（曾国藩：《讨粤匪檄》）。洪秀全创立的神学异端，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遭到思想围剿和武装镇压，这是毫不奇怪的。西方基督教的传教士们也对他深恶痛绝，恶毒攻击。他们公开声称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尽管披着基督教的外衣，“一个西洋基督徒绝不能同情这个运动，因为他犯了滔天大罪，损坏了它（指基督教）的优点”（艾约瑟：《访问天京记》）。

不难看出，在我国历史上，有宗教神学的思想统治，就有与之对抗的无神论传统，同时还有与正统宗教神学作斗争的神学异端。历代农民革命运动，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高举神学异端的旗帜而开展革命斗争的起义军，既是破坏封建制度的主力军，同时也是反对正统宗教神学的主力军。起义农民创立神学异端，不只是为了反对正统宗教神学而已，根本目的在于反对宗教神学为之服务的封建制度本身。起义农民之所以要举起神学异端的旗帜，不是由于受宗教宣扬的天国福音的诱惑，只不过是利用宗教的形式，更有利于组织群众同封建统治者进行斗争，尽快在尘世实现理想的天国。

三、神学异端的思想实质

神学异端是在农民革命斗争中产生的一种宗教意识形态，它是起义农民用以同正统宗教神学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正统宗教同神学异端各有独特的阶级内容，它们在社会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

正统宗教神学，受反动统治阶级的扶植、信奉，为维护反动黑暗的封建专制制度服务，麻痹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服服贴贴地忍受封建统治，用来世进天国享受幸福的幻想欺骗人民。它是人民的鸦片。

农民战争中的神学异端，是革命农民借以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一种手段，它鼓舞人民坚持革命斗争，把现世利益看得比正统宗教所约言的来世幸福为重，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以献身精神去摧毁封建统治，为世上的老百姓夺取天国，即改造不合理的社会，争取劳动人民当前生活状况的改善。

由于阶级利益上的对立，农民战争中的神学异端，尽管在形式上同正统宗教有共同

性，在内容上却是对立的。

（一）它推倒正统宗教崇奉的偶像，重新塑造自己崇拜的权威。

一切宗教总要塑造一个“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53页），作为信徒们一致敬奉的超自然力量的象征。这种偶像，儒家正宗神学称做上帝，佛教谓之如来，道教谓之玉皇，基督教叫做天主。名称虽不同，实质却一样，都是一种至上的人格神，万能的造物者，慈悲的救世主。人们只能对之虔诚膜拜，乞求它的恩赐和保佑。统治阶级崇奉的正统的至上神，始终只卫护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这些人作恶多端，不但不遭责罚，反而升官发财。苦难已极的劳动人民，世代虔诚敬神，从未得到保佑。

起义农民自己塑造并崇奉的神学异端中的尊神，同正统宗教神灵是不一样的，它只对劳动人民发慈悲，支持、鼓舞他们进行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对于反动的封建统治者则主张大张挞伐。

诚然，多神主义的中国农民，在和平时期，对统治阶级树立的神灵也很崇拜，他们敬天惟恐不周，礼佛无时不勤。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他们终于觉悟到，世代烧香拜佛，谨守清规戒律，还是落得个饥寒交迫、妻离子散的处境。当革命高潮来到时，他们横下一条心，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顾不得正统宗教立下的清规戒律了，干脆踢倒那些封建制度的保护神，全靠自已救自己了。方腊起义不敬神、佛、祖先，洪秀全起义怒砸宣圣木主，就是如此。洪秀全声讨群神，说那些都是“无知无识之木石坭团纸画各偶像，有口不能言，有鼻不能闻，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持，有足不能行之蠢物”（洪秀全：《原道觉世训》）。

农民起义军塑造的异端神灵，诚然也是一种超自然的权威，但它是农民革命意志的体现，也就是农民革命权威的化身。农民崇拜这种神，所得的社会效果，应作具体分析。在革命发动时期，不是涣散革命斗志，而是更好地把革命意志和革命力量集中起来。农民从蒙昧主义统治下刚刚觉醒过来，不可能找到别的思想武器去同正统宗教神学作斗争，从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利用宗教形式，塑造具有异端性格的神灵偶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无可厚非的。农民塑造了并崇奉着异端神灵，并不是使自己在现实面前无所作为，对反动势力不加反抗；恰恰相反，是为了鼓舞群众万众一心，敢于斗争，去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在农民战争的秘密发动时期和革命高涨时期，神学异端所显示的积极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二）改造对天国的幻想，力求在现世实现理想的天国。

神学异端同正宗神学对待未来的理想也有不同的态度。一切宗教总要用一种美妙的理想世界来吸引它的信徒，给信徒们一种精神安慰。不同的宗教，对理想世界的描绘固然有很大的区别；实现理想世界的途径，尤为不同。正宗神学的反动本质是欺骗麻痹人民，“对于工作一生而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列宁全集》第10卷第62页）。也就是说要进入天国，先得有一副菩萨的心肠，慈悲为怀，宽大顺从，忍受现实的一切苦难，对尘世的恶势力不加反抗，不作斗争。神学异端同这种劝人面向未来的正宗神学不同，它虽是劝人追求一个未来的理想，却引导信徒们面向现实。它让信徒们觉悟到正宗神学许诺的那个未来天国是靠不住的、等不来的，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得组织起来，武装起义，团结一致为争取生存的

权利、改变当今苦难的处境而斗争，要抛弃那种屈从现实，隐忍苟活的怯弱态度。神学异端的信徒们，从当时被剥削被压迫的处境出发，去设想所要追求的幸福生活，树立一种“与现实制度相反的理想”。在经济上要求平均，反对剥削；在政治上要求平等，反对封建等级压迫；在社会道德上要求平等互助，诚信不欺，反对强凌弱、众暴寡，尔虞我诈。张角要求实现财物公有、共享的“黄天太平”世界，攻击“积财亿万”而不肯“周急救穷”的剥削者为“仓中之鼠”；法庆自称是普济众民的“大乘”，怒杀鱼肉人民的反动官吏僧尼；方腊要建立“一人有难，众人相助”的“永乐”社会；洪秀全更集中历代农民革命理想，制定在尘世实现太平天国的方案，即在平分土地的前提下，做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朝田亩制度》）。所有这些，都是在抛弃了追求来世天国幸福的幻想之后，从现实切身利益出发提出的要求。这些要求和理想，是同神学异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些革命理想是希图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实现“共享太平”的社会，从经济学上看，是十分错误的；但从政治斗争的立场上看，却是进步的、合理的，它表达了劳动人民反剥削反压迫的强烈愿望，对农民革命战争起了巨大鼓舞作用。

（三）放弃宗教修炼方法，把开展武装革命斗争作为夺取天国的手段。

正统宗教神学为信徒指点的一条进入天国的道路，就是脱离现实斗争，潜心修炼，广积“阴功”，虔诚地向神灵祷告，乞求赐给天国的幸福。还威胁信徒们，如不顺从统治者，违反世俗礼法，破坏宗教的教规，死后灵魂就要堕入地狱，受到比今生更苦的惩罚。正统宗教神学，用威胁和利诱的两手，使人们屈服于神灵，屈从封建统治者。

神学异端与之相反，它不是劝人忍受现实苦难，而是鼓励他们献身于实现斗争，用鲜血与生命去夺取革命的胜利，建立尘世的天国。暴力行为，在神学异端中，不但不加禁止，而且受到鼓励。法庆宣布，“杀十人为十住菩萨”；方腊主张，“只有杀人，才能成佛”；红巾军宣称，“杀尽不平方太平”；洪秀全提倡“手持三尺（剑）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洪仁玕：《洪仁玕自述》）。这些仙佛世界的叛逆者，无不主张打倒封建帝王，摧毁反动官府，杀尽贪官污吏，建立农民革命政权，以实现农民的革命理想。

不言而喻，神学异端和正统宗教在思想内容上的差异，根源于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利益上的对立。两类宗教属于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对封建制度采取截然不同的立场，在农民战争中起着不同的作用。

四、神学异端的历史命运和历史作用

神学异端是革命农民根据斗争的需要而创造的符合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方式和文化水平的一种宗教，它和正统宗教同时存在，是社会上敌对阶级的思想对立的表现。“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53页）神学异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采取了秘密发动起义和公开武装斗争的方式，所以它同正宗神学相比，历史命运大不相同。神学异端一出现，就遭到反动统治阶级的疯狂仇视和镇压。封建统治者动员其上层建筑的全部力量，乃至煽起正统宗教的狂热，妄图将神学异端一举扑灭。自黄巾起义以来，异端神学的经典，被称为“妖书”，遭到焚毁，异端

教徒被称为“妖贼”，惨遭杀戮、流放。历代封建统治者，为防止和镇压异端教徒的起义，制定过残酷的刑法，明朝统治者明令宣布，凡弥勒教、白莲教等“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象，烧香集众，夜聚晓散，扇惑人民，为首者绞，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大明律集解附例》卷11）不独中国封建统治者，连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对活跃在中国土地上的异端教徒——太平军的攻击也极为恶毒。他们辱骂太平军是一群“流氓无赖”，攻击他们“到处放火”、“强奸妇女”，丑化太平军“穿着五花八门的丑角服装”，“有一头长而黑的或染黑的乱蓬蓬的头发，一双疯狂的眼睛”，诬蔑他们是一群“光怪陆离的怪物”，“发出悲惨的叫喊”，“把人吓得死去活来”（转引自马克思：《中国事件》）。反动派恶毒地丑化、攻击、屠杀神学异端的信徒们，这是毫不奇怪的，是他们的反革命阶级本质的表现。

尽管如此。神学异端在农民战争中所发挥的积极的历史作用，仍是掩盖不了的。

第一、起义农民利用神学异端作组织手段，把散居四方、素不相识，毫无联系而又散漫保守的群众，组织成一个战斗的集体，灌输给他们强烈的组织观念，坚固的纪律性，使散漫的农民把个人行动纳入为共同目的而斗争的集体行动之中，使个别信心不足的人，迅速感受集体力量的伟大而增强必胜信心，乃至甘心为革命的胜利而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第二、起义农民利用神学异端这种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宣传革命的政治主张和崇高的理想；号召群众抛弃对天国的幻想，重视现实生活，投身于现实阶级斗争，把追求人世生活看得比追求冥世生活更宝贵。神学异端同正统宗教一样，往往宣传和推行禁欲主义。对神学异端的禁欲主义，也应作具体分析。农民战争中的禁欲主义风纪，乃是起义过程中一个必经的阶段。“如果不经这个阶段，社会的最下层是决不能发动起来的。社会的最下层要发展自己的革命毅力，要明确自己和社会其他一切阶层对立的地位，要结成一个阶级，必须从何下手呢？必须把自己还可以和现存社会制度妥协调合的一切完全抛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420—421页）

第三、神学异端以正统宗教神学的对立面出现，在神学营垒树起了反叛的旗帜，大大动摇了正统宗教神学的统治地位，为揭露、批判正宗神学提供了新的途径，推动了无神论反对宗教神学的斗争。神学异端还为反神学理论提出了一些新原理、新范畴，对无神论史和哲学史的发展都是有意义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哲学，不得不再改换自己的形式，这也同农民的神学异端对它的冲击分不开。神学异端形式掩盖下的农民革命思想，包含着民族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的精华，应当予以批判地继承。

神学异端在农民战争中虽然发挥过一定积极作用，但它毕竟是一种宗教意识，不具有宗教意识形态的共性，正是这共性方面，不可否认对农民战争带来了消极影响。我们并不因为肯定神学异端对农民战争的某些积极作用，而忽视它的消极影响。

首先，起义农民利用落后的宗教形式来表达革命的政治内容，虽是不得已而采用的手段，仍是不足为法的。农民起义之所以能动员广大群众，主要地是靠革命的政治纲领、口号。多次农民起义，直接提出鲜明的政治纲领、口号，没有披上宗教外衣，同样深入广泛地发动了群众。说明农民起义并不必然同神学异端相结合。农民革命的纲领口号，一经同宗教的组织、口号相结合，不可避免地会带上一些神秘主义色彩，从而模糊政治纲领、口号的阶级性质和革命内容。

其次，起义农民利用神学异端的形式，把农民革命的权威，塑造为“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作为崇拜的偶像，这种把革命领袖当作神的作法，同正统宗教神学一样，无非是把人间的力量外化为超人间力量的形式，在认识路线上是十分错误的。这种偶像崇拜发展的结果，必然败坏起义群众与农民领袖之间亲密的血肉联系和深厚的阶级感情，对革命运动产生恶劣影响。

再次，起义农民在神学异端思想支配下，按未来天国的模式，构造了美好的理想生活的蓝图。这种理想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乌托邦。起初，在强烈的宗教感情支配下，起义农民对实现这一理想的信心是坚强的，斗争是坚决的。一旦这种理想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的时候，群众的革命热情，必然迅速消退，终至革命组织全部涣散而不可收拾。

总之，神学异端和正统宗教神学，都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事物，它们是社会上敌对阶级的阶级意识对立的表现。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两种宗教意识，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别性。只强调共同性而忽略其差别性，就不易说明它们不同的历史遭遇和历史作用；只看到差别性，而忽视共同性，就会忽视神学异端在历史上的消极作用。我们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则指导下，对历史上的宗教现象和宗教斗争进行具体分析，正确地总结反神学斗争的历史规律。

（上接第9页）因而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只有矛盾双方的相互排斥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而矛盾双方的相互联系在事物发展中不起任何推动作用。有一种意见认为，矛盾双方的相互排斥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双方的相互联系是一种阻止事物发展的保守力量。这种意见显然是不完全正确的。矛盾双方的相互联系，有时是保守力量，有时则不是，不能一概而论。仅从没有相互联系就没有相互排斥，没有相互联系阶段，就没有相互转化阶段而言，也不能说矛盾双方的相互联系只是一种保守力量。相互排斥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呢？也不能绝对化。比如反动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过火的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与其说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不如说是阻止事物发展的力量。

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坚持对立统一规律。因为唯物辩证法及其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是人类认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然而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及其核心对立统一规律，就必须彻底扫除林彪、“四人帮”堆在它身上的积秽，彻底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并把它运用于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的实际。在当前，科学地阐明矛盾的同一性在辩证法中的地位，深刻地揭示矛盾同一性的客观内容以及它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辩证法这一领域，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理论禁区很多，现在仍然有许多禁区没有冲破，同一性问题就是突出的一个。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总结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把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工作大大向前推进。